

N 本期聚焦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养

奚洁人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提高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现实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训练，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因此，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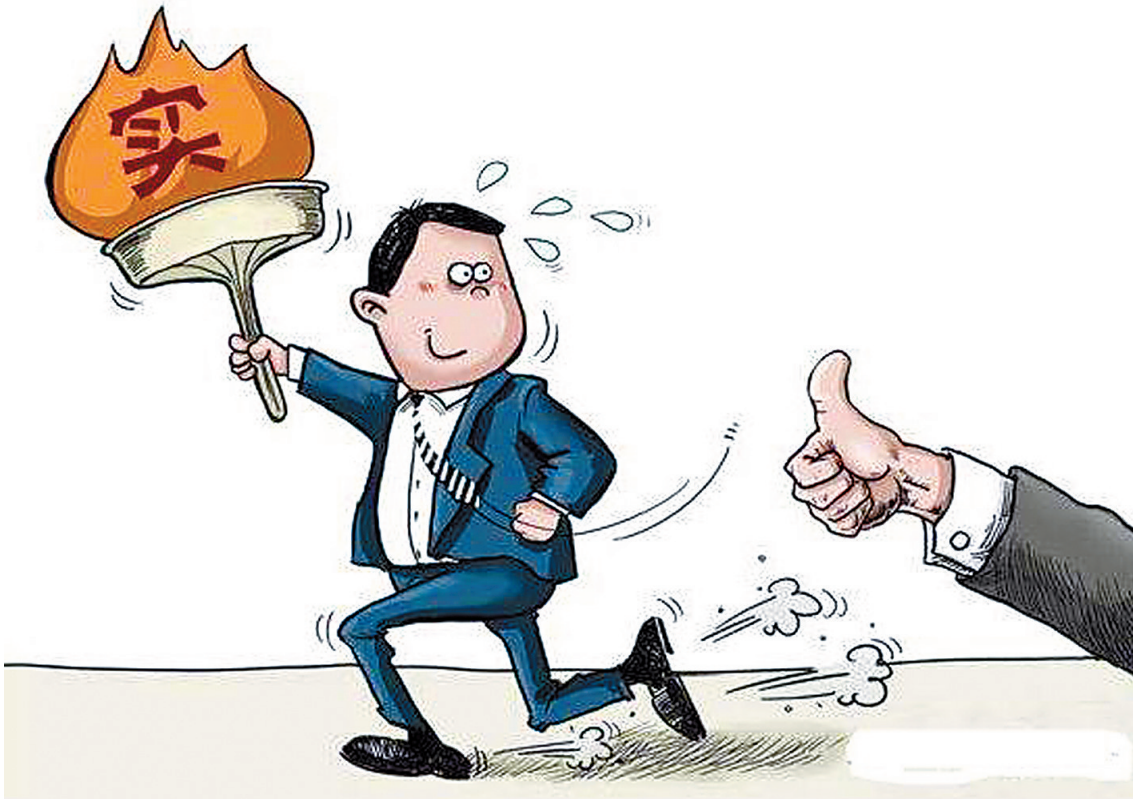
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内涵和丰富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辩证法。认真学习、准确把握这一辩证智慧的精神实质，深刻领悟其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武器，是丰富和提升领导干部哲学素养的宝贵营养剂。在此，择其三点加以阐述。

贯通古今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特别重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的传承和创新开发，强调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极其丰富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以非常简洁的六个逻辑阶段加以概括和分析。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与历史关系，他深刻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他指出，“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由此，这条道路的逻辑起点推进到5000多年前的文明源头，强调了历史文化底蕴。

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重要的辩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我国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



图片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实干兴邦
认知与行动相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同时，“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实干兴邦”，既是对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充分肯定。

首先，“实干兴邦”，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文化哲学中具有丰富的知行合一论思想传统。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强调“不断让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实干兴邦”的知行合一论，更加强调“崇尚实干”，即实践和“行”的重要性。他指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实干兴邦”的知行合一论，是科学工作方法论和正确政绩观。一是高

度重视调查研究。这是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二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工作方法。为了干成事，要真干、实干、苦干、巧干。所谓巧干，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工作方法，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三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做到精准有效。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见实效。四是要有“成功之道在于锲而不舍”的政治品格和持之以恒的钉钉子精神。五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领导干部要有“政贵有恒”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和境界，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要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矛盾法则
重点与全面相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这里，重点和全面的关系，就是矛盾法则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对事物本身的矛盾及其各种关系的辩证思考和分析处理，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

择。比如，关于改革方法论，他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是辩证统一的，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中强调要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以及供给和需求等四个关系，等等。

矛盾法则，强调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所谓两点论，就是要有全局观点、整体意识，要全面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切忌片面性。所谓重点论，就是做事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防止平铺直叙、平均使力、不得要领。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问题意识，他指出“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增强问题意识，最终是要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这种不回避问题而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的理念和做法，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即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N 有此一说

“人口红利”
还是“人脑红利”？

欧阳志远

中国应对人口老化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学界仍然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基于当前出现的低生育状况，要达到更替水平，就要彻底放开人口控制，甚至还要刺激人口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另一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劳力紧缺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科技进步解决，一旦人口增长失控就会出大问题。

关于“人口红利”，有三点需要深入认识：首先，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适当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其他社会因素搭配才能正发挥。几个后发人口大国获取红利的背景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大量外移。其次，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才能正发挥。这个能力在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临界状态，它很难通过增长来补偿，稍有不慎便可酿成灾难。再次，劳力数量的作用，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能正发挥。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相对低下的时期，贫困的成因是自然资源转化能力低下，根源在国民素质。

“人口红利”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认识，是一种由或然性推理产生的较大概率因果联系。考察所有人口膨胀的空间不难发现，能够获得“红利”的只有少数，而且时间不会很长。人口在更多地域一直表现为负担，其极端效应可以称为“人口黑洞”，即资源被无穷吞噬。“红利”转换到“黑洞”容易，“黑洞”转换到“红利”较难。

人口老化问题露头之后，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受到质疑。人口承载力最终取决于环境容量，环境容量可以分为绝对环境容量与相对环境容量，绝对环境容量虽未达到极限但受社会条件约束的环境容

量。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多数地区相对环境容量接近饱和，少数地区绝对环境容量已经饱和。基本国策的实施，为中国争取了必要的发展空间，也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环境容量。虽然在有些地方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但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主次颠倒，那么就是因瑕毁璧。

关于人口抚养，既有老龄抚养比，还有少龄抚养比，两者相加的总和抚养比，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状况。如果通过开放甚至刺激生育来抵消老龄化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少龄抚养比快速上升，从而推动总和抚养比激增。随着社会环境演变，少龄人口抚养的投入不断攀长。这样劳动人口的总体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不在人口年龄结构，而在人口真实贡献。人少可以从容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性推动发展。何况中国社会宗亲观念深固，多子多福观念影响深远，同时从众心理特强，人力资源不至于枯竭。

根据熵增原理，应对低生育危机的难度，远小于高生育危机的难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只能因势微调，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人口低增长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机遇。完全可以将智能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追求“人脑红利”。但仅靠智能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生态化的，很多民众的审美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体素质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出路在发展普惠精英教育，进行人格塑造。人格包括真善美，要以美引领真善，将美感熏陶渗透科技传授和道德培养，使优生优育思路辩证复归。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观点集粹

“全面两孩”呼吁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陈雯在《中国人口报》刊文指出：历经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将在下一个四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进入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而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需要更高层次的人口，高层次的人口需要高质量的亲职养育。因此，认识并处理好生育数量与养育质量的关系，提高婴幼儿生命质量、助力母亲产后的成

长与发展、巩固家庭的整合与凝聚才是二孩国策最为迫切的政策导向。为此，无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如专设二孩或高龄产妇产咨询室、广设母乳喂养室和托幼空间等），还是全面的社会政策支持（如延长产假陪产假、职工生育保险等）都应秉承友好美好型生育文化，坚守养育重于生育、尊重人性，倡导关怀的基本原则，这是世界各国文明进程不可违背的共同规律。

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在《北京日报》刊文指出：西方有一家智库的一位专家谈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文化缺乏西方文化所蕴含的利他精神。其实，中华民族是有丰富的利他主义、利他思想的。譬如，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儒家学术形成的早期，在讨论人的时候，不是把人作为孤立的个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当成群体当中的一分子来看待。因此中华文化是己浑然一体的文化。到了孟子，讲的是“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不仅要尊敬自己的老人，也要尊敬社会上其他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后辈，也要爱护他人的后辈，这就又把己合为一体了。这能叫利己吗？《礼记》当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君子要尊敬别人，这里的贱己不是自己鄙视自己，而是严于律己，要尊重别人严于律己。另外要“先人后己”，这个社会就能够兴起“让”的风气。《尚书》中有四个字，舍己从人。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讲舍己为人，舍己救人。

供应链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大成在《经济参考报》刊文指出：绿色供应链和全球供应链是供应链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农业供应链将从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到服务的组织体系、科学化水平和质量安全溯源能力入手，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为目标，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利用可视化、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业供应链将在包括产品设计、采购、生产、仓储、包装、运输配送、销售到售

后服务在内的全生命链条，实现协同化、服务化和智能化。而流通业供应链的目标是，构建采购、分销、仓储、配送和综合服务供应链协同平台，引导生产端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新型供应链服务企业。以“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供应链金融可以深度切入农业供应链、制造业供应链和流通业供应链环节，实现信用精准评估和资金有效供给，既能助力资本与产业融合，又能有效防范供应链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日报

N 学者观察

新型城镇化重在四个融合

周健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也面临着产业和城镇各自盲目发展、没有形成协同合力等问题。这样就会导致，一方面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另一方面产业没有高质量城镇化基础支撑，产业和城镇处于粗放增长，结构和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

由此出现一系列问题，一是难以持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好的发展机会。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不仅造成大量资源的占用和浪费，而且也对社会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三是尽管城镇人口总量上增加，但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隔程度也在增加。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当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无法得到保障和提升，就不会有

意愿留下来为产业和城镇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凡此种种，都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道而驰。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推进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产城人融合”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从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上看，这一概念基本局限于“一城一镇”。而若想真正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更应从“大”处着手，也即是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产城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四个融合。

产业融合。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形成产业链条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产业集群。一是可以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各种资源的关联性和互利性，实现它们之间产业的高度融合；二是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地利用各产业中的生产要素，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实现各类产

业不同区域的联动与共赢；三是可以降低生产、交易和管理成本，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

城镇融合。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多核心、多层次城市群。一是可以消除区域壁垒，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要素流动，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提升中小城市、小城镇参与产业承接和职能分工的机会，提高资源与城镇体系的融合度，实现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三是产城融合实现了集中性和规模性的双重叠加，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产城人融合。在产城融合的

依托下，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促进人口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及其产业之间有序流动与聚集，进而使得人口数量和结构与产城发展相匹配，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和谐共生发展。一是“人”的发展空间不断增大，产城融合会带来“人”的迁移空间和就业空间不断增大，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行为习惯也会随之不断改变提升，从而推动了“人”自身的发展。二是产城的发展空间不断增大。多策并举实现“人”在产业之间和城镇之间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实现城镇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相互匹配，这样既有利于产业优化升级和城镇集聚高效，又可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日报